

Studies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浙江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

张彬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Studies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浙江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

张彬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 / 张彬等著. —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308-06293-0

I. 漢… II. 張… III. ①教育家—研究—浙江省②教育
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K825.46 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661 号

浙江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

张彬 等著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zupress@mail.hz.zj.cn)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293-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学贯中西的浙江教育家	6
第一节 近代浙江教育家群体概述	6
一 从传统转向现代	7
二 从浙江走向全国	11
第二节 近代浙江教育家群体网络	15
一 基本情感纽带	15
二 重要活动阵地	18
三 主要互动方式	20
第三节 近代浙江教育家群体特征	22
一 脚踏实地,献身教育事业	22
二 筚路蓝缕,引领多方领域	27
第二章 铸造中国大学的现代雏形	34
第一节 现代大学理念的倡导者	34
一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35
二 蒋梦麟的大学理念	44
三 竺可桢的大学理念	55
第二节 改造北京大学的举措	62
一 转变观念,端正校风	62
二 遵循思想自由的原则	66
三 改革教育和教学体制	72
第三节 提升浙江大学的策略	77
一 礼聘一流专家学者	78
二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81

三 建立民主管理体制	86
四 提高学生全面素质	90
第三章 探讨中等教育的改革实践	97
第一节 倡导人格教育的思想	97
一 宣传人格教育的学说	97
二 诠释人格的时代新意	102
三 提出全人生指导思想	104
第二节 改革师范教育的实践	107
一 论师范学校的宗旨	107
二 论师范学生的特质	109
三 探讨师范教育改革	111
第三节 春晖中学的办学模式	116
一 以陶冶人格为主旨	116
二 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120
三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123
第四章 开创中国幼稚教育之先河	126
第一节 开展幼稚园课程研究	126
一 阐明幼稚园课程的目标	127
二 研究幼稚园课程的内容	131
三 探索幼稚园课程的编制	135
第二节 开创儿童心理学的实验	147
一 论儿童期教育的重要意义	148
二 科学划分儿童的年龄阶段	149
三 论儿童的心理特征及教育	157
第三节 培养幼稚教育专业人才	164
一 论幼教专业人才的重要性	165
二 论幼教专业人才的培养	166
三 论幼教专业人才的素质	170
第五章 推动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	173
第一节 传播近代新教育的出版人	173
一 投身近代教育出版业	173
二 集聚上海商务印书馆	177

第二节 编辑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	181
一 推出各类配套教科书	181
二 编写自然科学教科书	185
三 改编国文、修身教材	187
四 提高教科书编写质量	192
第三节 创办、主编近代教育期刊	195
一 创办及主持综合性教育期刊	196
二 创办《中学生》和儿童期刊	200
三 开辟《东方杂志》科普之窗	202
四 为教科书的出版制造舆论	204
第六章 促进现代教育理论的传播	208
第一节 传播西方进步的教育学说	208
一 导入西方教育学的先驱	209
二 译介西方教育学论著	212
三 探讨教育学理论基础	215
第二节 制订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219
一 西方美育思想的导入	219
二 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	222
三 倡导学生的全面发展	224
第三节 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227
一 译介苏维埃俄国教育	228
二 论教育的本质和职能	230
三 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	232
主要参考文献	236
后记	239

绪 论

浙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距今约 7000 年前存在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6000 年前存在于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与距今约 5000 年前存在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吴越文化的主流，后来又与存在于浙江中西部地区及浙南瓯江流域的两个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建立起可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史前文明。

浙江是传统教育基础十分深厚的地区。早在东汉初年，上虞私人所办的蒙学机构已颇具规模；两晋时期，平阳、永嘉两地建有官学，世家大族对家学的注重蔚然成风；隋唐至两宋，各地官学普遍设立，书院讲学之风极盛，奠定了学术繁荣、教育发达的局面；元、明、清三代，教育依然兴盛，文风经久不衰。作为文化之邦，浙江自古以来曾涌现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如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程端礼、金履祥、许谦、王守仁、刘宗周、黄宗羲、朱之瑜、陈确等。他们大多不囿于儒家经学的束缚，提倡经史实学，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尤其在批判传统教育弊端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后人学习和仿效的榜样。

鸦片战争以后，浙江又是我国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区域之一。随着宁波、温州等地的先后开放，外来势力大举进入的同时也引入了新观念，注入了新的生机。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下，浙江不乏学贯中西、走在时代前列的教育家。他们受前人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摈弃了盲目自大的传统心理，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以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他们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盛和西方教育的进步，开始把目光从古圣贤的经典移向域外世界，从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中探寻改革中国教育的良方，并将之付诸实施。

浙江近代诸多的教育家中，有的立足浙江，在教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如维新运动时期致力于批判旧学、倡导新学宣传活动的汤震、陈虬、宋恕，清末兴学运动中最早创办新式学堂的孙诒让，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从事中等教育改革的经亨颐，为浙江大学的崛起作出卓越贡献的

竺可桢等；有的走出浙江，在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清末导入西方教育学理论的王国维，主持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蔡元培，献身于近代教育出版事业的张元济、杜亚泉，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杨贤江，开创近代幼儿教育的陈鹤琴、张雪门和张宗麟等；有的则专注于某一学科的教育，成为学科教育方面的杰出代表，如曾任京师同文馆数学总教习的李善兰，在音乐、美术教育方面造诣很深的李叔同，毕生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马寅初，在近代国文教学改革方面颇有影响的夏丏尊、陈望道等。

本研究所涉及的近代“浙江教育家”并不包括以上所有类型的人物，鉴于研究对象与“近代中国教育”应有更为直接的关系，特作如下界定：第一，就时间而论，不考虑教育家的生卒年月，关键看其主要活动时间是否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第二，从空间来看，无论这些教育家一生去过多少地方或主要生活在哪，只关注其原籍是否在浙江省，是否对中国教育产生过全国性的影响；第三，无论他们在某一学科教育方面取得多大成绩，或以何种方式作用于教育，主要判断其是否对近代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突出贡献；第四，受全书框架的限制，考察其对近代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不可能包罗万象，主要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幼儿教育、教育出版、教育理论等几个方面。综上所述，我们确定的近代“浙江教育家”主要以蔡元培、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杜亚泉、经亨颐、鲁迅、蒋梦麟、竺可桢、张雪门、陈鹤琴、杨贤江、张宗麟等人为代表，他们在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分别涉足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幼儿教育、教育出版、教育理论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具有开创性的成就。其中，经亨颐、竺可桢虽主持浙江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但影响波及全国，其贡献是全国性的。

目前，上述教育家的年谱、传记、日记、书信、教育论著以及全集等已大量整理出版。年谱主要有《蔡元培年谱长编》、《张元济年谱》、《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王国维年谱新编》、《鲁迅年谱》等；传记主要有《蔡元培传》、《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王国维传》、《竺可桢传》、《鲁迅传》、《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罗振玉传记汇编》等；日记包括《张元济日记》、《经亨颐日记》、《竺可桢日记》等；书信有《张元济蔡元培往来书信集》、《张元济书札》、《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国维全集（书信）》、《鲁迅日记书信诗稿札记》等；论著选编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王国维文集》、《经亨颐教育论著选》、《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蒋梦麟教育论著选》、《竺可桢文录》、《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陈鹤琴教育论著选》、《杨贤江教育文集》、《青年修养

与青年教育:杨贤江文选》、《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张宗麟乡村教育论集》等;全集主要有《蔡元培全集》、《鲁迅全集》、《陈鹤琴全集》、《杨贤江全集》、《竺可桢全集》等。这些出版物较系统完整地收集、整理、保存了近代浙江教育家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史料,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详尽、丰富且宝贵的资料。

对于上述浙江教育家的研究,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专著有《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金林祥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梁柱著)、《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孙常炜著)、《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周一平等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顾明远等著)、《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马勇著)、《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王伦信著)、《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黄书光著)、《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孙培青、郑登云编)、《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张彬著)等,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一般均为个案研究,缺乏群体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第二,研究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教育家研究成果多一些,如蔡元培、陈鹤琴、竺可桢等;有的教育家研究成果少一些,如张雪门、杜亚泉、经亨颐等。第三,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如对鲁迅的研究,文学方面的成就多一些,教育思想涉及少一些;对张元济的研究,一般的出版事业多一些,教育出版事业涉及少一些;即便是对蔡元培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教育学术、哲学、文化等方面,关于大学理念的研究涉及很少。

本研究拟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近代浙江的教育家进行群体研究。近代浙江教育家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尽管彼此年龄不一,家庭背景各异,自小均受旧式教育的熏陶,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新式教育,并且大部分人曾有出国留学或考察的经历。传统和近代参半的教育经历以及新旧学问兼备、中西思想集于一身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既熟谙传统经典,又深知西方文明;既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又具有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较好的外语水平以及一定的历史眼光和民主观念,在知识素养、价值取向、社会联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截然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从而成为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优良品质的现代学者。近代浙江教育家受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对于当时的社会危机表现出强烈的关怀和参与意识。他们把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思化为内在动力,满怀救亡图存的爱国激情,逐步从家乡走向近代中国的教育舞台。

近代浙江教育家在地域构成上有着明显的集聚现象。鉴于中国地区差异明显,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在其“区域系统”(re-

gional systems)理论中,按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将近代中国划分为八大区域,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属于长江下游区域,现代化程度最高,其中杭州、宁波、绍兴又是该区域的核心部分。就本研究所涉及的教育家而言,他们几乎集中于绍兴、宁波、嘉兴三个地区,如蔡元培、罗振玉、经亨颐、鲁迅、竺可桢、陈鹤琴、张宗麟等来自绍兴地区,蒋梦麟、张雪门、杨贤江等来自宁波地区,张元济和王国维来自嘉兴地区,这显然与所在地区现代化程度较高不无关系。这些教育家在全国从事教育活动的地区也较为集中,除浙江省外,主要聚集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国家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城市,活跃在各类学校、杂志社、出版社等文教机构,并且因同乡、同年、同事关系以及师生、朋友、亲属情谊,交织成一个群体网络,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合作。

其次,本研究拟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浙江教育家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分高等教育、幼儿教育、中等教育、教育出版以及教育理论等几个方面。以高等教育为例,蔡元培和蒋梦麟把一个传统的国立大学办成中国第一所富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竺可桢使一个地方性大学走向现代化大学之途,并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在中等教育领域,经亨颐遵循人格教育思想,将浙江第一师范和春晖中学办成国内名校;杨贤江提出的“全人生指导”,对青年学生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幼儿教育方面,近代有“北张南陈”之说,张雪门开办北平幼稚师范学校,陈鹤琴在南京创办我国第一个幼教实验中心,他们均为中国幼儿教育和儿童心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张宗麟作为陈鹤琴的助手,是我国男大学生当幼儿教师的第一人。在教育出版业方面,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杜亚泉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理化部主任也有 28 年,他们在编辑出版教科书、学术著作以及西方名著的翻译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教育理论方面的建树,则有王国维对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导入、蔡元培对教育方针的阐述和杨贤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传播等。

就近代浙江教育家而言,有的主要涉及某一领域,如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致力于幼儿教育,蒋梦麟、竺可桢致力于大学教育,经亨颐致力于中等教育,张元济、杜亚泉致力于教育出版事业;有的则涉及多方面领域,如蔡元培既是民国教育方针的制订者,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大学理论的开拓者;王国维既是最早的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的主持者,又在早期西方教育学理论导入过程中功劳卓著;杨贤江在注重指导青年学生的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传播也有突出贡献。

本研究在对浙江教育家的作用进行分类探讨时,不搞简单拼凑,而是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找出共性,阐明各自的特色。如高等教育部分,先分析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各自对于现代大学理念的认识以及形成原因,再分别阐述他们在主持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时如何为实现现代大学理念而努力;中等教育部分,以经亨颐的改革思想贯穿始终,先探讨他如何在浙江第一师范和春晖中学实施人格教育,再阐述在人格教育思想影响下的杨贤江如何致力于青年学生教育,创造性地提出“全人生指导”的思想;幼儿教育部分,将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在开创幼稚教育方面的努力,归纳为幼稚园课程研究、儿童心理学实验研究和幼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三部分展开;教育出版事业方面,将浙江教育家所作的贡献分成教科书出版和教育期刊两个部分阐述。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确定的浙江教育家,大多纳入分类研究的研究对象,但也有个别人物受全书构思的局限未被列入,如鲁迅、罗振玉等。

陶行知曾于1921年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指出,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教育家”,只会运动,说官话;一种是“书生教育家”,只会读书,教书,写文章;还有一种“经验教育家”,盲动,盲行,乱搞一通。在他看来,这三种都不是好的教育家;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具备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能创造新的教育理论,开辟新的教育领域。近代浙江的诸多教育家就具备陶行知所说的一流教育家的特征,他们在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折不挠地从事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

学贯中西的浙江教育家

翻开中国近代教育的史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众多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浙江教育家。浙江近代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和教育家,绝不是偶然现象,既是浙江灿烂文化的孕育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所致,也与地处沿海、较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域特点密切相关。浙江教育家饱受地域传统文化的熏陶,继承了历代浙江学者对传统和现实所持有的批判精神,并且大多接受过西方文化和教育的洗礼。他们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下,脚踏实地献身于教育事业,在理论思维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较强的创新欲望,因而在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第一节 近代浙江教育家群体概述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学术上出现诸多学派,奠定了文风鼎盛的基础;元、明、清三代依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文风不衰。近代开埠后,浙江是我国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区域之一,随着宁波、温州等地的先后开放,于外来势力大举进入的同时也引入了新观念,注入了新的生机。

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下,浙江涌现出一大批学贯中西、走在时代前列并享誉全国的教育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杜亚泉、经亨颐、鲁迅、竺可桢、蒋梦麟、张雪门、张宗麟、陈鹤琴、杨贤江等。他们受前人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和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摈弃了盲目自大的传统心理,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以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他们走出浙江,积极投身于全国教育实践,深入探讨近代中国的教育问题,努力推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现代化。

一 从传统转向现代

作为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重视教育是浙江历来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东汉初年，上虞私人兴办的蒙学机构已颇具规模，王充就读的书馆有小童百人以上。五代吴越国时，钱镠虽为武人出身，但广开才路，注重教育，曾建国学，聚图籍。宋代以后，浙江的文化教育尤为繁荣，府州县学普遍设立，僻静之处书院林立，许多学者热衷于传道、授业。北宋初年，胡瑗曾在湖州主持州学，所创造的“苏湖教法”名噪一时；庆历年间，被誉为“庆历五先生”的杜醇、杨适、楼郁、王致、王说，均在浙东积极从事教化活动；皇祐年间，王开祖在家乡华盖山设东山书院，从学者数百人。南宋的浙江，更是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甬上四先生”舒璘、沈涣、杨简、袁燮在奉化、定海、慈溪、鄞县等地授徒讲学；吕祖谦晚年主持丽泽书院，亲编教材，制定《学规》；陈亮、叶适分任永康五峰书院、东阳石洞书院主讲，有志于培养匡时救世、建功立业的人才。元代，程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详载读经、学史程序，成为家塾教学计划之范本，也被奉为郡邑学校的读书准绳。明代，王阳明从政之余热心于教育，每到一处，均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刘宗周讲学 20 余年，历东林、首善、证人三书院，创立蕺山学派。明末清初，黄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宁波甬上书院、余姚姚江书院等地讲学，从者甚多，其领衔的清代浙东学派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放兼容是浙江传统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两汉、西晋、北宋等朝末年，北方战乱，大批人口南迁，浙江成为北人落户的首选之地。人口的流动带来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削弱人们对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偏执和盲从，逐渐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文化心态，这在历代浙江学者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王充虽严厉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却认为“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道、法、墨等各家精华，并涉猎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丰富发展自身的思想；吕祖谦以“不私一说”、“不名一师”的学风以及兼取“朱学”和“陆学”之长的风格而著称，孝宗淳熙二年(1175)曾相邀朱熹、陆九渊兄弟至江西信州鹅湖寺探讨学术，后人称其“平心易气”，“宰相之量也”；被朱元璋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兼采朱陆之长，折中儒佛思想，“于学无所不通”；王阳明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改造了正统儒家学说；黄宗羲不仅“折中朱陆”、“宗王而不斥朱”，而且吸收了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一本而万殊”、“舍众以合一”的思想。

这种重教的传统和开放兼容的心态,促使很多浙江人面对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来冲击作出积极的反应,从而成为近代浙江文化教育转型的策动力。作为文化之邦,浙江各县各乡取得功名者多,世代为官者多,他们原本一直以封建的农业经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作为立身之基。随着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革,他们也开始重新选择生存的方式,一部分人率先跻身于商业界和实业界,并清醒地认识到振兴教育与振兴实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宁波商人所说的一番话足以反映这一思想:“无论兵战或商战,均需要高深之学问。我宁波商人,忧勤贤劳之心,坚忍不拔之志,固卓卓在人耳目,但其弱点所在,亦不能为之讳,盖其眼光甚小,仅仅以在商言商为生涯,学问之事,莫不相关,足以富其家,而不足以与图富国之道,此才有余而识不足之故也。”^①他们对发展新式教育给予高度重视,纷纷捐资办学,在近代浙江营造了一种创办新式学校的浓厚氛围。门户开放后,外国传教士在浙江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先是在宁波、温州,然后向内地发展,如 1845 年的之江学堂、1846 年的崇德女子学堂等。这些教会学校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内容与方法,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现代的观念、意识与能力,逐渐得到国人的认可与肯定。此外,国家的日益衰败促使很多有识之士放眼四海,把希望寄托在向西方学习之上。在近代轰轰烈烈的留日、留美热潮中,浙江外出求学的人很多,并且表现得很活跃。1903 年正月,浙江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浙江潮》,向国人宣传新思想新教育,还发表《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敬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等文章,动员乡人出国留学。据统计,1909—1929 年间,我国 1269 名清华留美学生中,浙江有 157 名学生,占 12.37%,居全国第三。^②

近代浙江教育家生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正值中西思想汇合、新旧意识交错的端口。他们尽管彼此年龄不一,家庭背景各异,但总的说来,自小受旧式教育的熏陶,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新式教育,并且大部分人曾有出国留学或考察的经历。如蔡元培、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等出生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因此精于国学,大多应过科举,并拥有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通过留学、出国考察

^① 张其昀:《序》,《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 73 期,1928 年 8 月。

^②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1 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55 页。

以及阅览国外报刊书籍等方式，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使自身知识结构不断更新，日臻完善。19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教育家有鲁迅、蒋梦麟、竺可桢、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杨贤江等，他们幼年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主要在新式学堂中完成，其中鲁迅、蒋梦麟、竺可桢等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耻辱和维新思想的启蒙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杨贤江等人则在青少年时期经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成年后，有的还走出国门，师从名师，接受日本和美国正轨的教育训练，取得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详见表1-1。

表1-1 近代浙江教育家教育经历一览

姓名	国内教育经历	国外教育经历
蔡元培 (1868—1940)	6岁入私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等，17岁考取秀才，20岁中举人，24岁考中进士二甲34名	1907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研读心理学、哲学史、美术史以及文学等。1912年再次赴德，后又赴法等国学习。1920年冬至1921年秋，赴欧美考察教育，研究学术，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和美国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张元济 (1867—1959)	幼时入私塾读书，师从查济忠先生，后随朱福洗先生。20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	1908年赴日本考察1个月。1914年赴荷兰、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德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国考察
罗振玉 (1866—1940)	5岁入私塾读书，12岁读唐宋诗词，15岁遍读诸经，16岁考中秀才，后数次赴乡试未中	1909年赴日本考察教育2个月
王国维 (1877—1927)	5岁进私塾，背诵和学作诗文。7岁开始接受封闭式的传统教育，16岁考取秀才，之后两次乡试不中。1898年在上海《时务报》工作的同时，进入东方学社学习外文与理化等	1901年秋，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入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并研究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次年夏因病归国。1911年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京都，研习中国古代经史
杜亚泉 (1873—1933)	16岁中秀才，21岁肄业于崇文书院	
经亨颐 (1877—1938)	自幼入私塾学习制艺，兼及诗文	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1905年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教育与数理，历时8年

续表

姓名	国内教育经历	国外教育经历
鲁迅 (1881—1936)	6岁入私塾，12岁在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1898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	1902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在东京中止学医，研究文艺，直到1909年8月归国
蒋梦麟 (1886—1964)	幼年入私塾，12岁入绍兴中西学堂，曾考中秀才。1902年入浙江高等学堂，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	1907年6月赴日考察1月。1908年8月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半年后转入社会科学院，学习教育。1912年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教育学。1917年获哲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竺可桢 (1890—1974)	幼年随章镜尘先生学习，后入绍兴天华府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先后在澄衷学堂、复旦公学校求学。1909年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	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先在伊利诺大学学习农业，1913年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1915年获气象学硕士学位，1918年获博士学位
张雪门 (1891—1973)	幼年从塾师读四书五经，国学根底颇深。后插班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1911年毕业。1924年到北京大学注册课任职员时，在教育系旁听，研究幼稚教育	
陈鹤琴 (1892—1982)	7岁入私塾，14岁入教会办的蕙兰中学，1911年2月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秋季转入清华学堂	1914年考取庚款留美，先入霍普金斯大学，1917年毕业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在克伯屈、孟禄和桑代克等指导下学习心理学、教育学，1919年获教育硕士学位
杨贤江 (1895—1931)	1912年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堂，1917年毕业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的同时，系统旁听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并参加商务印书馆函授部英语科学习	1927年秋赴日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张宗麟 (1899—1976)	4岁从姑母认字读诗，1908年入绍兴袍渎的敬敷义塾，1915年考入绍兴浙江第五师范，1917年转学至宁波浙江第四师范，1920年毕业。次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1925年毕业	

可见,由于自幼深受浙江传统文化的熏陶,近代浙江教育家不仅具有江浙文人的书卷之气,而且继承了前辈海纳百川的思维容度,在学术上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传统和近代参半的教育经历以及新旧学问兼备、中西思想集于一身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既熟谙传统经典,又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既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又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较好的外语水平以及一定的历史眼光和民主观念,在知识素养、价值取向、社会联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截然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士大夫,而成为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优良品质的现代学者。

二 从浙江走向全国

近代浙江教育家在地域构成上有着明显的集聚现象。从表 1-2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蔡元培、罗振玉、经亨颐、鲁迅、竺可桢、陈鹤琴、张宗麟等均来自绍兴地区,蒋梦麟、张雪门、杨贤江等来自宁波地区,张元济和王国维来自嘉兴地区。也就是说,这些教育家集中于绍兴、宁波、嘉兴三个地区,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表 1-2 近代浙江教育家籍贯分布

姓名	籍贯
蔡元培	山阴(今绍兴)
张元济	海盐
罗振玉	上虞
王国维	海宁
杜亚泉	会稽(今绍兴)
经亨颐	上虞
鲁 迅	绍兴
蒋梦麟	余姚
竺可桢	上虞
张雪门	鄞县
陈鹤琴	上虞
杨贤江	慈溪
张宗麟	绍兴

长期以来,浙东学术对浙江学人的熏陶以及开埠后浙江的社会变迁与